

再论数字 7 在蒙元时代的 呈现及其象征意义

温海清

摘要 数字 7 及 7 的倍数或末尾整数位为 7 的数字，在蒙元时代的西方文献中，十分显眼。然而，学界迄今对此缺乏切实讨论。该类数字实际上具有象征意义。通过清理 7、70 以及 17 等数字可发现，在以《蒙古秘史》为代表的史料和伊利汗国的史料中，该类数字多具“虚”的象征意义；在元王朝相关的史料中，则多具“实”的意义。需作进一步区分的是，元代用于记录当日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诸多现实事项时，该类数字“实”指意义明显；而在其他场合使用到该类数字时，则多呈现出模式化现象，其“虚”指意义较重。在阅读蒙元时代文献中若遇该类数字，大可不必拘泥于其“实”指意义，而更当留心其“虚”指意义。

关键词 七 七十 十七 萨满教

作者温海清，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上海 200433）。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1)02-0195-11

一、问题缘起

每一个数字都有其独特性，且各具意义。数字 7 在内亚人群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就具有象征意义，呈现出一种所谓“尚 7”的习俗。数字 7 及 7 的倍数或末尾整数位为 7 的数字，在关涉内亚人群的考古材料及以汉语文献为主体的各类记载中，均有程度不一的诸种呈现形态。该现象在内亚地区的出现，当不晚于青铜时代。^①

13、14 世纪是属于蒙古人的时代。与蒙古时代之前内亚其他人群一致，数字 7 在蒙古人那里同样具有象征意义；而且，与该数字有关的观念、信仰以及它所附着的意义，伴随蒙古人的脚步而渗透至被统治区域人们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蒙元时期东西方历史文献中保存着与数字 7 相关的信息极为丰富，然而到目前为止，当时“尚 7”的传统习俗问题，尚未引起我们充分的重视。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亚史系教授拉里·莫西斯（Larry Moses）对蒙元时代的各种数字尤为敏感。他曾对《蒙古秘史》中从 1 至 10 以及其他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数字，进行过细致的统计分析和解读。^②例如，

① 笔者曾梳理始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迄至蒙元时代数字 7 在内亚地区的呈现，揭示“尚 7”习俗出现时代极早，且有其自身发展脉络。参见温海清：《数字“七”在内亚人群中的呈现及其意涵——迄于蒙元时代的初步考察》，《中古中国研究》第 2 辑，上海：中西书局，2018 年，第 93—122 页。本文聚焦于蒙元时代数字 7 的诸种现象，对其作全面而深入的清理与解析，尤其是对当时代所呈现的具体特点予以详细探讨；而所涉蒙元时代史料则全不同于前文，凡前文已征引之史料均予避免，除非关键且必要，再次征引时将作删减处理。特此说明。

② Larry Moses, “Triplicated Triplets: The Number Nine in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sian Folklore Studies*, vol. 45, no. 2, 1986, pp. 287-294; Larry Moses, “Legends by the Numbers: The Symbolism of Numbers in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sian Folklore Studies*, vol. 55, no. 1, 1996, pp. 73-97. 后一文由陈一鸣译：《数字的传奇：〈蒙古秘史〉中数字的象征意义》，《蒙古学信息》2000 年第 1 期。

他对数字9作过讨论。9在《蒙古秘史》中共出现20次，它的出现与对成吉思汗生活的描述相一致，在他生前和死后都没有出现这个数字。而且，“数字9预示着的每一场合，或是成吉思汗面临重大危险，或面对重大事件。”“包含数字9的每一个事件，均可以相同的方式加以解释：它或者表明一个主要的事件、一种夸张的描述”；或者表明成吉思汗超自然的、宗教的或神秘的行为。换言之，《蒙古秘史》中凡出现数字9，均与成吉思汗有关，它意味着数字9于蒙古人而言具有特殊意义。^①

而对于数字7的问题，拉里·莫西斯则指出，7作为一个独特的数字，它在《蒙古秘史》中出现过26次。他总结数字7出现的场合：表示7人的组合，出现过16次；表示杖笞数，出现过4次；表示时间概念，出现过3次；其他（无法确定）场合，出现过3次。拉里·莫西斯由此认为，“数字7在很多情况下似乎都是一种文体的需要。”^②

数字7真的只是一种文体的需要吗？事实上，该数字对于当时蒙古人的重要意义，尚未引起拉里·莫西斯的特别注意；而数字7及7的倍数或末尾整数位为7的数字及其所含意义的解读，则更未能进入他的视野。因此，有必要全面而具体地探讨数字7在蒙元时代东西方文献中的呈现及其意义等相关问题。

二、原生型数字7的呈现及其象征意义

近年来，学者们在讨论蒙古人祖先起源传说议题以及蒙古君主继位仪式问题时，都已注意到数字7反复出现的特殊现象。

钟焯在梳理中古时期蒙古祖先传说问题上，揭示出另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叙述主题，即“七位幸免于难的脱险者”的祖先蒙难传说。该类传说的叙述要旨是，蒙古人即便在仅剩7人的窘迫情形下，仍能绝境逢生，竟至复兴。而此类模式化叙述，在蒙元时代东西方史料文献中都有所呈现。^③例如，成书于14世纪的埃及马木鲁克王朝史书《编年史》，记载7位鞑靼逃难者的故事：由3男4女组成的7位经历灭族之祸的逃难者，在邂逅一位由黑狮养大的“狮孩”后，其中一位女子与狮孩结成夫妻，并育一子，唤名“鞑靼汗”，这位鞑靼汗成为全体蒙古人的祖先。^④该主题衍生出的同类故事，蒙元时代另有两则。13世纪前半叶出访蒙古的教皇使节加宾尼，叙及蒙古人与契丹人之间的一场战争，蒙古人战败后仅剩7人逃生；《元典章》记载一桩发生于元至大年间的民间案件，内中亦叙及蒙古人被残杀后仅剩7人的故事。^⑤而在蒙古时代之前或之后，主题相类的蒙古祖先起源传说更是屡屡可见，如波斯地理学家噶尔迪齐（Gardīzī）完成于11世纪的《记述的装饰》，记载了7位逃难鞑靼人的名字，并且此7人名字复又成为7个部落的部族名称的故事；察合台语史书《选史——胜利之书》则记载了蒙古人始祖有7人和7匹马避难于额尔古涅—昆岩石内而幸免于难的故事。钟焯针对上述所有记载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讨论，同时对于史料中不约而同出现数字7的问题，他指出：“正如蒙古故事中所出现的‘七个逃难者’只能当作传说而非史实来理解，寄蔑人族源故事中的最初七部同样未必就是实际数目。”该数字具有“象征基数性质的特定含义”。^⑥这一判断无疑是富有见地的。

不过，以下两点或可稍作补充，以供进一步讨论。

其一，关于7分部族的问题，《记述的装饰》所记载的早期部分蒙古人西迁至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流域而出现达靼7部落，其形成时间自然不晚于11世纪。而在更早的时代、更广的区域上，这种早期蒙古

① 拉里·莫西斯：《数字的传奇：〈蒙古秘史〉中数字的象征意义》。蒙古人重9这个数字，常表达隆重之意，如“九旂白纛”“九次叩首”；又常表示敬献的最大数目，如祭祀时，羊、鹿、野、豕等祭品常用9数或9的倍数，上都祭祀时彩缎练绢各9匹，以白羊毛缠若穗者9，等等。参见黄时鉴：《元代的礼俗》，《黄时鉴文集》第1册，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92页。

② 拉里·莫西斯：《数字的传奇：〈蒙古秘史〉中数字的象征意义》。

③ 钟焯：《中古时期蒙古人的另一种祖先蒙难叙事——“七位幸免于难的脱险者”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

④ 参见钟焯：《中古时期蒙古人的另一种祖先蒙难叙事——“七位幸免于难的脱险者”传说解析》。

⑤ 道森：《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周良霄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0—21页；《元典章》卷41《刑部卷3·谋反·乱言平民作歹》，陈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402页。

⑥ 参见钟焯：《中古时期蒙古人的另一种祖先蒙难叙事——“七位幸免于难的脱险者”传说解析》。

人7分部族的记载就已有所呈现。据P. t. 1283藏语文书,内中载有一部落名为“Ye-dre七族”,森安孝夫等学者将其比定为8世纪中叶活跃于贝加尔湖一带的俞折国(部),它属室韦部落。^①另据《旧唐书》载,唐大中初年(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瓦解之后,“室韦分回鹘余众为七分,七姓室韦各占一分。”^②所谓“七姓室韦”,尽管其居地仍有争论,但此部分室韦部落的7分状况,亦属明显的事实。^③以上反映的均是在蒙元时代之前,所谓“九姓达靼”部落集团内部各部分存在的“七分部族”的现象,而数字7当非实数。倘若我们以此数字为实数而去求取“九姓达靼”之数,并进而再以此去求取“三十姓达靼”之数,恐将失之过正。

其二,与“七位幸免于难的脱险者”的模式化叙述相类似的记载,或可再补充两则。据《完者都史》载,元代中期元廷与察合台汗国发生冲突,察合台汗国诸王也不干、怯别遭遇败绩,一千前锋死阵,“仅有七人逃生”,这7位生还者“逃往沙斡兀立和长史驸马处报告:‘我之前锋,因受杀戮,除七人外,无逃生者。’”^④另一则记载涉及著名历史事件,元军攻下常州后曾实施屠城,最后仅剩7人幸免于难。此记载见于《宋史纪事本末》内丘濬对蒙古攻宋下常州的一段评论之中:“至是,攻常州,忿其久不下,招之不从,于是役城外居民运土为垒,并人筑之,杀人煎膏取油炸炮,及城陷之日,尽屠戮之。一城生聚,何啻千万!斩艾之余,止有七人伏于桥坎获免。夷性残忍,一至此哉!”^⑤

罗新近年来在讨论北魏皇帝的即位仪式问题上,特别强调代北旧制的“内亚性”,其观察视角亦及于蒙古时代。在蒙古大汗继位的传统仪式上,数字7亦频繁可见。海敦修士《东方史精华》描绘成吉思汗的登位仪式,“七个部族的首领齐举黑毡,把成吉思抬到宝座上,称他为汗。”《瓦萨夫史》记载元武宗海山的蒙古即位仪式:“依照旧俗,海山盘腿坐在一张白毡上。七个最重要的王公负责把他送上宝座。”蒙古人的即位仪式,与魏孝武帝的即位仪式相类似处在于,由黑毡蒙7人或由7位显贵将加冕者扶上毡席。^⑥或可稍作补充的是,依据元代后期文献记载,在蒙元皇帝的即位仪式上,还有另一番样态。杨瑀称:“累朝于即位之初,故事,须受佛戒九次方登大宝。而同受戒者,或九人或七人,译语谓之‘暖答世’。”^⑦所谓“受佛戒”,自然与佛教有关,不过内中涉及9或7人之数,则与前述蒙古人“重9”、“尚7”传统相合;陶宗仪更明言“此国俗然也”,^⑧所谓“国俗”即指蒙古本身的习俗。

综观前述蒙古祖先起源历史记忆中“七位幸免于难的脱险者”的主题,以及君主继位仪式上7人将君主扶上宝座之描绘,数字7在上述场合中均呈现出象征意义。^⑨而上所举诸事例中数字7的具体意义,则需作区分。

在“七位幸免于难的脱险者”这一叙述主题下,数字7显然只是一种模式化数字,是虚数而非实数。例如,常州屠城后子遗数字今虽已不可确知,然据《泰定毗陵志》载:“本郡兵火后,至元十二年冬,招到城土居人户仅数十家。”另据大德辛丑年间常州路儒学教授白斑所撰《重修武进县记》称:“中更焚荡,城中居民存仅数十家,往往它郡民居之。”^⑩与屠城后仅剩7人之说相比,“数十家”之数,或许更

① 参见白玉冬:《九姓达靼游牧王国史研究(8—11世纪)》,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7—34页。

②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15页。

③ 钟焄:《黑车子室韦问题重考——以〈会昌一品集〉与敦煌藏语文书为据》,《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白玉冬:《九姓达靼游牧王国史研究(8—11世纪)》,第168—171页。

④ 哈沙尼:《完者都史》(Tārīkh-i Uljāyū),转引自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91页。

⑤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106《蒙古陷襄阳》,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156—1157页。明人丘濬的说法,或当承袭自元时代而来,这并不表明丘濬本人的观念受到蒙古人的影响。

⑥ 以上转引自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第31—32、第36—37页。

⑦ 杨瑀:《山居新语》,李梦生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页。

⑧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0页。

⑨ 据《元史·爱鲁传》载,爱鲁征金齿诸部,“得七驯象以还”。另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两相比较,其中不仅狼、鹿或驯象具有象征意义,数字7与4,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语境中当亦存有不同的意义。《元史》卷122,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012页;《史记》卷110,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81页。

⑩ 杨印民辑校:《大德毗陵志辑佚(外四种)》,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48、99页。

符合历史实情。数字7的意义在此实在明显不过：常州屠城之后并非仅剩7人，而是指幸存的人数实在太少！换言之，在“七位幸免于难”的叙述主题下，7应是作为一种代表数目“少”的那层含义而呈现的。

在蒙古君主即位的这一特定场合中，上述史料中出现的数字7具有象征意义，此应无疑义。不过，这一数字在此特殊场合下，它需要在当日现实的政治活动中加以切实的展演，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应是一个实在的数字，有其特定的象征意义，但非虚指。另据《引弓民族史》载，1251年，从东方来的蒙古西征军中，“有可汗的七位儿子，他们各领一个骑兵万户，每个万户有三千人”，紧接其后即详列出7位蒙古诸王的名字。^①此乃当时文献记载当时代事，亦应具有明确实指含义。

而在上述两层含义之外，数字7作为一种虚数，它又还存有喻指数目“多”的那一层含义。据《蒙古秘史》载，“合必赤的子，名篾年土敦，生子七人。”李文田曾指出：“‘篾年’者，蒙古语多子也。”所谓“七人”与“多子”，正相契合者也。^②成吉思汗败主儿勤人于客鲁涟河上的阔答阿岛（荒岛）的“朵罗安·孛勒答兀（Dolo'an Bolda'ut）”地面，罗依果对译其蒙古语意为“七座孤山”，^③所谓7座孤山，当非实指其数，而是喻指有许多个山头的地方。

另据《蒙鞑备录》载，成吉思皇帝有“女七人”，此当为虚数；《史集》虽列其女儿仅六人，应当只是知名者而已，真实数字定高于此数。^④再据《史集》载，当蒙古宗王们欲劝止蒙哥亲征南宋时说到：“[陛下身为]全世界的君主，已有了七个兄弟，为什么还要亲自去和敌人作战呢？”《史集》又称：“[蒙哥]的七个居于高位的兄弟按照官位高低站在他的面前”，汉译者于此注引波伊勒英译本称，“七兄弟”指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末哥、拔绰、岁哥都、雪别台。然而依据《史集·拖雷汗纪》，拖雷有十子，蒙哥居长，次子朮里客早夭，三子忽睹都无子。^⑤此7子之数看似实指，实不尽然，完全无视忽睹都的存在是不妥当的。此处数字7仍应是“虚”指，也应当从喻指数目“多”的那层含义来理解。

由上所述可知，数字7具有象征意义，它呈现出“虚”指的意义偏重，^⑥而“实”指的意义则较少。至于该如何判断蒙元时代文献中数字7是指“多”还是指“少”的问题，则需依据具体语境。数字7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作为象征意义所源起的一种原生型数字，7的倍数或末尾整数位为7的类型化数字，也因此而呈现出特殊的意义。

三、70、17等类型化数字的呈现及其析解

70、17等数字，是与数字7密切相关的类型化数字，它们在蒙元时代东西方文献记载中同样有着丰富的呈现形态，非常值得解析。

据《蒙古秘史》载，十三翼之战后，札木合将铁木真的部众“教七十锅都煮了”。^⑦《圣武亲征录》的记载有所不同：“彼军初越二山，半途为七十二灶，烹狼为食。”王国维曾指出：“《秘史》：‘札木

① Robert. P. Blake & Richard N. Frye (eds.), "History of the Nation of the Archers (The Mongols) by Grigor of Akanc."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2, no. 3/4 (1949), p. 327.

② 参见乌兰校勘：《元朝秘史（校勘本）》第45节，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4页；李文田：《元秘史注》卷1，清光绪二十二年浙西村舍刻本。

③ 《元朝秘史（校勘本）》第136节，第126页；Igor De Rachewiltz (tran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vol. 1, Leiden & Boston: Brill, 2004, p. 59.

④ 赵珙：《蒙鞑备录》，王国维笺证，《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6页b；拉施特主编：《史集》第1卷第2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2页。

⑤ 《史集》第2卷，第266、244页。另据《史集》载，忽必烈奖赏伯颜，“他对伯颜平章和在场的他的七个兄弟，都赐予了诏书和牌子。”7个兄弟，亦应作虚数解。《史集》汉译本讹误为伯颜平章奖赏忽必烈，兹据英译本改。参阅《史集》第2卷，第355页；W.M.Thackston translated & annotated, *RashiduddinFazlullah's JAMI 'U' T-TAWARIKH- Compendium of Chronicles: a History of the Mongols, Part Tw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56.

⑥ 兹再举例。伯颜、阿朮应急诏乘传觐见，“换了七次驿马才到”；伯颜攻襄阳，“建造了七架庞大的射石机”；“桑哥做了七年的宰相”，这些数字应均为虚指。参见《史集》第2卷，第319页、343页、349页。

⑦ 《元朝秘史（校勘本）》第129节，第119页。

合将赤那思地面有的大王每，将七十锅煮了。’蒙文则云：‘赤那孙可兀的答阑脱豁惕不察勒合周。’案：蒙古语狼为赤那，子为可兀，则此句就字面译之，可云：将狼之子七十锅煮了。至拉施特书，以烹人属之太祖。时赤那思人方从太祖为十三翼之一，太祖决无自烹其属部之理，其诬盖不待辨矣。”^①所谓“拉施特书”即《史集》，该书所载与《蒙古秘史》完全相反，“[成吉思汗]下令在火上架起七十个锅，在锅里将被他抓住的作乱的敌人[活活]煮[死]。”^②内亚史家塞诺从常理出发，以为煮食的很可能只是70匹狼而已；并进而指出，“风箱的数字与我们上文见到的锅的数字也是一样的，札木合正是用七十口大锅煮了赤那思”，70是一个“超自然的数字”^③换言之，70这个数字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而且也应该是一种虚数，非实数。

《蒙古秘史》多处提及以“答阑”（意为70）连缀而称的地名，如“答阑·巴勒渚惕（Dalan-baljut）”，“巴勒渚惕”指草原上有浅平之水的地方，其意或作“70个沼泽”之地。^④再如“答阑·捏木儿格思（Dalan-nemürges）”，“捏木儿格思”指“外衣”或“毡衫”，其意为“70件外衣”之地。^⑤70这个数字在这些地名中，是虚数，均喻指数量多。倘若从当时蒙古人“尚7”之观念而进一步加以思考的话，蒙元时代层出不穷的此类数字地名问题，大多或可从此角度予以解答。^⑥耶律铸《松声》诗有云：“岩声何事韵铮铮，风入寒梢鸟自惊。七岭夜寒筛汉月，九霄霜冷奏秦筝。”耶律铸自注“七岭”为：“行宫地名”。^⑦陈得芝先生指出，“七岭”是“七十岭”之略，也就是达兰达葩之地。^⑧7能否与70等同？事实上，7或70，均有喻指数量“多”的那层含义，其正可作等意解。

伊利汗国早期一份有关蒙古编年史的文献《满刺忽忒卜皮篋中的蒙古消息》（Akhbār-i Mughūlān dar anbāna-yi Mullā Qutb），该文献记载蒙古帝国早期著名事件“同饮班朱泥水”的另一个叙述版本：“他（指成吉思汗）最初为人所知的事迹，发生在靠近乞台一侧的班朱泥河谷。在那个地方人们一连数日无法找到任何食物。他军队里的某人射到了一只野雀，炙烤了它并将其献给了他。[成吉思汗]下令，将其分成七十份，自己从中取了一份，他自己的那份不比另外七十人更多。因为那次分配的公正，人们全都拥护、跟从了他，并效忠于他的事业。”^⑨该记载中的70之数，很显然也只是一种象征性数字。这是后世在追溯往昔史事时的一种虚构，或得诸传闻，其实情已不可确知。

70作为虚数，十分频繁地见于对蒙古早期史事的描绘中，而此显然是蒙元当时代在追溯往昔史事时，因缺乏档案文献记录而作的一种追忆，其虚指的意味甚浓。据《史集》载，撒里黑汗曾说：“阿勒赤一塔塔儿人中有七十个宗支，但除古木思一昔章外，没有一个男子汉！”也速该邀请晃豁坛部一起攻打泰亦赤兀惕部，“泰亦赤兀惕人杀死该部落的[人]很多，以致他们的骨头装运回来的有七十车之多。”^⑩《史集》又载：“名为札刺亦儿的蒙古人……有若干部落住在怯绿连河境内，它们共有七十古列延……按照这

① 佚名：《圣武亲征录》，王国维校注，《王国维遗书》第13册，第10页a-b。

② 《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114页。

③ 丹尼斯·塞诺：《突厥的起源传说》，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8、76页。另，所谓风箱的数字，是指《史集》记载一则传说故事，蒙古先祖宰杀70头牛马，用它们的皮制作了70个风箱，用风箱煽起火焰，融化山壁，走出深山向外迁徙。参见《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252页。

④ 《元朝秘史（校勘本）》第201、218节，第255、285页。

⑤ 《元朝秘史（校勘本）》第153、173、175、205节，第161、192、193、263页。罗依果译作“70件毡衫”，*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vol. 1, p. 76.

⑥ 陈晓伟在对“答阑不刺”之地的研究中已指出，应从蒙古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加以解释，在古代蒙古社会中，习惯于用“答兰（70）”来比喻数量多。参见陈晓伟：《释“答兰不刺”——兼谈所谓“德兴府行宫”》，《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

⑦ 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99册，第432页上。

⑧ 陈得芝：《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3—224页。

⑨ 高木小苗、邱軼皓均关注到此则记载。邱軼皓还进一步指出，《瓦萨夫史》中记载有察合台汗都哇讲述成吉思汗的一则情节大体类似的故事，即70人共享一只麻雀。本文所引史料转自邱軼皓文。参阅高木小苗：《クトゥブツデーニ・シーラーズイー书写くモンゴルの诸情报について——その基础的研究とイルハン国初期の史料としての重要性》，《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第82期，2011年，第95-143页；邱軼皓：《如何“进入”蒙古历史——两则与“共饮班朱泥河水”相并行的故事及其传播》，《文史》2019年第3辑。

⑩ 《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185、305页。

种[算法],该部落[共有]七万帐幕(khāneh)。”再,由于乞台人(契丹人)“对这部分札剌亦儿人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只有少数人得以逃脱”,“全部札剌亦儿人中[只有]处于敌人未能达到的一方、[共有]七十帐幕的一群人得以幸免”,这群幸免的札剌亦儿人逃至土敦—篾年的妻子莫孛伦的营地,发生冲突后将后者家庭残杀,海都因在外做客得以幸免。“这群札剌亦儿人干了这件事后,另一些残存的札剌亦儿部落来向这七十个人追究责任。”^①

当然,70也有作为实在数字的那层意义。据《蒙古秘史》载,成吉思汗编组千户、百户后,又设置“答阑·土儿合兀惕”,其意为“七十个散班”。^②此则记载是当日对蒙古帝国当时事项的切实记录,其“实”指含义则可予确认。

而比7、70等更大的数字,同样呈现丰富。据史载,在撒马耳干城东,“有个叫合塔完(Qatavan)的圣地,从该地将遣出七万殉教者,每名殉教者将为自己的七十名家属及族人求得恩荫。”^③蒙古征伐马鲁(位于今土库曼斯坦境内),城内聚集的突厥蛮人和毡的人“为数超过七万”。当时有位名叫巴哈木勒克的原马鲁城官员与蒙古人合作欲劝降马鲁,蒙古统治者“便派他和七名蒙古人一起到马鲁去”。巴哈木勒克对守城官劝降说,“七千蒙古军和一万签军正在接近马鲁。”马鲁攻陷后遭屠城,130多万人被杀。^④不过,据伊本·译阿昔儿《全史》载,1221年拖雷攻下马鲁之后屠城,死者计达70万人。^⑤再据《世界征服者史》载,蒙古第一次西征时,博儿客亦那颜攻下萨布扎伐尔,“下令屠城,从而被埋葬的尸体共计七万”;第二次西征时攻占篾怯思城,“他们下令割掉百姓的右耳,计有二十七万只耳朵。”^⑥上所述及的7万、27万、70万等人员伤亡的巨大数字,迄今仍困惑不少历史学者。倘若明了该类型数字具有象征意义,则知此为夸大之虚数,殆无疑义矣。

同样特别值得关注的数字,还应包括以7为尾数的数字,如数字17。该数字在不同历史时期内亚人群间亦频繁呈现,如在诺颜乌拉匈奴墓中发现用丝绸包裹有17盘辫发,在突厥碑铭中亦屡见17这个数字。^⑦这一数字在蒙元时代亦呈现频繁,兹举数例。如表示人员数目17人,蒙古灭金,史载“其军马将帅,旧谓之十七头项”;术赤汗脱脱统率60万军与那海带着的30万大军在帖儿古河开战,那海败北,“带着十七名骑士逃走”;1334年,摩洛哥人伊本·白图塔参加金帐汗国开斋节仪式上的阅兵活动时曾描绘到:“那天参加仪式的(万户)有十七位,他们统领着十七万人马”。^⑧如表示战斗次数17战,张柔一月之内,“与仙遇者凡十有七,每战辄胜。”^⑨如表示条陈奏事、上言次数等,商挺曾“前后大计,凡十有七”;脱脱曾“上表辞位,帝不允,表凡十七上,始从之。”^⑩又如,“[元贞初]行台御史及浙西宪司,劾江浙行省平章不法者十七事。”“自前宋以来,测景验气者凡十七事。”^⑪

数字17,究竟是“实”指,还是“虚”指,未敢遽断。安娜玛丽·席默尔(Annemarie Schimmel)曾比较详细地揭示数字17在古代近东的重要意义,认为它是一个“征服数字(Number of Conquest)”。^⑫虽其具体所指不明,但该数字具有象征意义则应是明显事实。或可稍加补充的是,《史集》在描写大都的

①《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18页;第1卷第1分册,第149页;第1卷第2分册,第19—20页。

②《元朝秘史(校勘本)》第191节,第225页。

③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3页。

④《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182—195页。

⑤D. S. Richards Translated., *The Chronicle of Ibn al-Athir for the Crusading Period from al-Kamil fi'l-Ta'rikh, Part 3: The Years 589-629/1193-1231: The Ayyubids after Saladin and the Mongol Menace*, Aldershot & Burlington: Ashgate, 2008, p. 227.

⑥《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05、318页。

⑦Jean-Paul Roux, “Les chiffres symboliques 7 et 9 chez les Turcs non musulmans,” *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vol. 168, no. 1, 1965, pp. 29-53.

⑧彭大雅:《黑鞑事略》,《王国维遗书》第13册,第23页a;《史集》第2卷,第154页;伊本·白图塔:《异境奇观——伊本·白图塔游记》,李光斌译、马贤审校,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年,第312页。

⑨《元史》卷147《张柔传》,第3472页。

⑩《元史》卷159《商挺传》,第3740页;《元史》卷138《脱脱传》,第3344页。

⑪《元史》卷170《尚文传》,第3986页;《元史》卷52《历一》,第1139页。

⑫Annemarie Schimmel, *The Mystery of Numb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19-221.

宏伟壮阔时称：“它的城墙上十七座城楼；一座城楼到另一座城楼的距离为一程。”今日有关元大都的研究，称并不能证实这一说法，“十七座城楼”之说显是虚饰之辞。^①另据《木阴历史选》载，察合台后期统治者合赞汗，“他的统治持续了十七年”。刘迎胜曾指出，依据察合台汗国历史纪年推算，合赞汗不可能统治17年时间，木阴乃误记。^②倘若从数字17具亦有象征意义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它或非误记，其实只是个虚数而已。此正是一种文化现象的呈现。

概而言之，数字70、17均具有象征意义。数字70作为一种虚数出现的频率较高，其“虚”指意义甚重；而数字17之含义，或“虚”或“实”，则需视具体情形而判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此处所讨论的数字70与17的史料，大多与大蒙古国时期史事相关，或多出于蒙古帝国西部的继承王朝的史料，而在蒙古帝国东部的继承王朝元王朝中，该类型化数字又有着怎样的具体呈现和意义呢？

四、类型化数字7在蒙元当时政治、社会中的现实呈现

上文就数字7以及70、17等类型化数字的呈现作了一番梳理，这三个数字在上述文献记载中多呈现为一种虚数，且都具象征意义。正因该类型化数字具有象征意义，在蒙元时代，事实上它业已渗透并影响到当时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兹先以两例说明之。

其一，类型化数字7在蒙元法律制度方面的呈现最为人们津津乐道，此即元代笞杖刑数多以7为断。《元史·刑法志》载：“国朝之制，笞杖十减为七”，“笞刑：七下，十七，二十七，三十七，四十七，五十七。杖刑：六十七，七十七，八十七，九十七，一百七。”^③为何元代一改之前时代以10为断的做法呢？最有名的解释来自同时代人叶子奇的说法：“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一百七。”^④这一说辞，或为表达大元用刑宽恕。不过有研究者认为，元代杖刑在以7为尾数之制外，仍有部分施以10为尾数之制；^⑤也有观点认为，笞杖处罚以7为断的做法并非始于蒙元，特别是“十七杖”刑的处罚，在唐宋时代就已出现。^⑥

虽有不同的解释，但元代法律上以7为断，应源于蒙古习俗，且并非始于元世祖。《蒙古秘史》的记载清楚地表明，在成吉思汗时代，对于怯薛值守人员误班的处罚，就已有杖责“七下”“三十七下”不等。^⑦在窝阔台时期，太宗皇帝元年（1229年），对于使用驿马而无牌面凭证者，处罚则是“杖七十”。^⑧另据史载，忽哥赤曾因额外多取野禽，忽必烈“责打了他七十棍”；《瓦萨夫史》载，察合台汗八刺在阿姆河以北地区横征暴敛，麻速忽劝阻其暴行，八刺十分不满，“下令杖麻速忽七下。”^⑨因此，蒙元时代在笞杖刑数上以7为断，是蒙古人“尚7”习俗的反映，它确实已影响到当日国家的政治生活。

其二，学界一般认为，蒙元时代曾有过四次影响较大的佛道辩论，其中三次（1255年、1256年、1258年）在蒙哥汗时期，另一次在忽必烈至元十八年（1281年）。四次辩论均以道教落败告终，裁处的具体措施，《大元至元辨伪录》《佛祖历代通载》以及一些碑刻材料中都有记载。^⑩

①《史集》第2卷，第322页；陈高华、史卫民：《元代大都上都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9—60页。

②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442页。

③《元史》卷102《刑法志一》，第2604—2605页。

④叶子奇：《草木子》卷之3下，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4页。

⑤范洋达：《元代施行杖刑以十为尾数之制及原因——以〈元典章〉为例》，《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暨2009年会议论文集》，长春，2009年，第548—567页。

⑥《宋史》卷199《刑法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967页。

⑦《元朝秘史（校勘本）》第227节，第297页。

⑧《永乐大典》卷19416《站赤》，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192页上。

⑨《史集》第2卷，第284页；转引自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196页。

⑩关于佛道辩论及《大元至元辨伪录》的史料价值问题，参见中村淳：《蒙古时代“道佛争论”的真像——忽必烈统治中国之道》，陈一鸣译，《蒙古学信息》1996年第2期。

1255年,第一次佛道辩论之后,蒙哥汗发布圣旨,“先生住着寺院地面三十七处,并令分付释门”^①。另据《1258年忽必烈令旨》载:“据少林长老告称:‘蒙哥皇帝圣旨里,委付布只儿为头断事官,断定随路合退先生住寺院地面三十七处。却有李真人诈传蒙哥皇帝圣旨,一面夺要了来。’这言语问得承伏了,是李真人差人诈传的上头。如今只依先前的圣旨,委付布只儿为头断事官,无断定三十七处地面,教分付与少林长老去也。准此。”^②

1258年,据《大元至元辨伪录》载:“马儿年(1258年),和尚先生每持论经文,问倒先生每的上头,十七个先生每根底教做了和尚也。已前属和尚每底,先生每占了的四百八十二处寺院内二百三十七处寺院,并田地水土产业,和尚根底回与也。么道。”^③比照之前的裁处,蒙古汗庭对道教方面落败的处置更趋严厉,不仅要求17位道士剃发为僧,且将原由道教方面所占据的482处寺院中的237处交还给佛教方面。

而晚至1280年代,蒙哥汗的裁处命令仍被一再重申。据《1280年虚仙飞泉观碑(一)》载:“到戊午年间(1258年),有口使慈提点赍奉到皇帝圣旨,节该:据口先生每占了和尚每寺院四百八十二处口断定回付和尚每二百三十七处口钦此。”《1284年大都崇国寺圣旨碑(一)》有云:“大都路蓟州遵化县般若院壹所,元系先生占住二百三十七处数内寺院。”而《1284年大都崇国寺圣旨碑(二)》亦载:“属蓟州的般若院,系二百三十七处数内回付到院子。”^④

从上述记载可知,“教十七个先生剃头做了和尚”^⑤,这一命令得到了执行;但对于归还寺院的问题,却一再被拖延,未得实行。“道家无底尽与划除,少林长老与僧议曰:若尽要了,恐其艰甚,却舍与二百八十处,但取讫二百二处。其见闻者称佛门之恩让焉。今上皇帝乃降圣旨曰:依着蒙哥皇帝断来圣旨。”^⑥对于佛道辩论裁处措施中涉及数字17、37、237的问题,或应特别注意两点:首先,上述裁处数字的提出,实出于蒙古最统治者蒙哥汗;^⑦其次,蒙古最高层提出应将道教方面所占据的482处寺院,划拨237处还给佛教方面,它体现的应是蒙古以7为断的习俗。当然这是一个实在的数字,而非虚指。

倘若我们对上举两事例中所呈现出的类型化数字7在蒙元时代具有象征意义能给予充分重视并予以认可的话,那么我们或可再举证更多的该类型化数字,在蒙元当日现实中的具体呈现。

军政机构设置数。太宗时期在汉地“始立三万户”,后又“增立七万户”;元廷于江淮沿线立“三十七翼”万户府,此37翼万户府机构,俱列于史书,可谓实有其数。^⑧镇守庆元路的蕲县翼万户府有千户所“17翼”,据《严忠济传》载,“忠济初统千户十有七”。^⑨刘晓指出,“蕲县万户府十七千户所的设置,与严忠济嗣位初期领十七千户有一定继承关系。”^⑩这一数字,应是实有其数。

驿站设置数。太宗时期,从哈刺和林至乞台国(中原)置“纳邻站”,“共三十七站”;而在藏地,“从汉藏交界之处起,直到萨迦以下,总计设置了二十七个大驿站。”^⑪

部分机构设置数,类型化数字7更是俯仰可见:“建织染七局于涿州”“市舶司凡七所”“燕北燕南

① 释祥迈:《大元至元辨伪录》卷3,元刻本。

② 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03页。

③ 释祥迈:《大元至元辨伪录》卷2。

④ 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第28、29、32、33页。

⑤ 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1,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54册,第713页下。

⑥ 释祥迈:《大元至元辨伪录》卷4。

⑦ 蒙哥汗对蒙古旧俗特别维护,“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然酷信巫覡卜筮之术”,云云。另,据史载,蒙哥登上汗位后整肃敌对力量,处死叛乱者“七十七人”。参见《元史》卷3《宪宗纪》,第54页;《史集》第2卷,第251页。

⑧ 《元史》卷149《刘黑马传》,第3517页;《元史》卷99《兵志二》,第2543页。

⑨ 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3《城邑》,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471页;《元史》卷148,第3507页。另,“大名长官欲以冠氏等十七城改隶大名,玉汝皆辨正之。”王玉汝属严氏家族麾下。《元史》卷153《王玉汝传》,第3616页。

⑩ 刘晓:《元浙东道“沿海万户府”考》,姚大力、刘迎胜主编:《清华元史》第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42页。

⑪ 《史集》第2卷,第69页;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8页。

通设立铁冶提举司大小一十七处”，^①不一俱列。至元十六年，元于全境置测景所，“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四海测验，凡二十七所”^②。

部分机构人员数量设置，与类型化数字7有关的情形亦复不少。宰相曾一度达17员，“今宰相至十七员，宜加裁汰”；枢密院亦曾置官17员，“令枢密院如旧制设官十七员”；太常礼仪院官曾有27员，“减太常礼仪院官二十七员为八员”；而各卫、都指挥使司、卫率府、都万户府以及寺、监等机构的令史员额，则大多置“令史七人”。^③

在祭祀贡品的数量上，《析津志辑佚·祠庙·仪祭》载：“太史院，涓吉。币十七，段各长一尺五寸。香、饼、稻、黍、粱、稷、枣、杞手、胡桃、生菜韭，共十七盘。莲子、大烛、黑木炭、柴，祝板十七叶。”^④这些都具有突出的蒙古特质。

由上所述可知，在蒙元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类型化数字7都有程度不一的诸种呈现形态，而这些反复出现的类型化数字，一定程度上又可视为是蒙古民族传统习俗所留下的印痕。同时须特别指出的是，蒙元当日现实生活中所呈现的类型化数字7，在大多数场合具有“实”指意义。

五、余论

行文至此，或可作一总结。原生型数字7及其相关类型化数字，具有或“实”或“虚”的象征意义。就该类数字所呈现的史料来源加以观察的话，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以《蒙古秘史》为代表的蒙古史料以及伊利汗国的史料中，该类数字多呈“虚”指意义；而在元王朝方面的史料中，则多呈现“实”指意义。倘进一步细绎，则可再予区分，元代用于记录当日法律和社会生活中诸多现实事项时，该类数字“实”指意义明显；而在其他场合使用到该类数字时，则多呈现出模式化现象，其“虚”指意义较重。

基于上述这一总体认识，或可再稍作延伸讨论。

原生型数字7及其相关类型化数字，在不同史料来源中呈现的差异，是否受到不同史料编纂者自身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对于此问题恐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数字7在阿拉伯世界及伊斯兰社会，原本就具特殊意义。阿拉伯人视7为“至尊至高”的极数，喻指数目众多，7不仅仅只是一个实数概念。^⑤10世纪，阿拉伯旅行家叙述海上闻见时，曾描写某海岛山巅上有个脚印，长达“70腕尺”。该游记英译者指出，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夸张”数字。^⑥蒙古人“尚7”习俗，与阿拉伯人以及广大伊斯兰社会对数字7的观念，似有相通之处。然而需指出的是，在东西方人类早期文明以及后续发育起来的西方文明社会里，在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及全世界其他诸种宗教文化传统中，数字7都有着特别的呈现并具特殊意义。蒙古“尚7”的传统与上述各文明和诸种宗教之间是否有所关联？这个问题亦难以明确回答。对于文化类同现象中的起源与传播问题，一方面当然无法否认或忽视诸人群、诸文化间的互相影响；但另一方面，亦当重视从各人群内部自身文化传统的发展脉络中去寻求解释。

而所谓内部自身文化传统的发展脉络，在此又提示我们需注意突厥—蒙古的文化传统。内亚人群具有较强的共性，这在“生活方式（草原游牧和森林狩猎）、社会组织类型（等级的和军事化的部族）、宗教（被神化的天）和巫术—宗教行为（萨满教）”上均有体现。^⑦据突厥文碑铭《阙特勤碑》叙述，“我父

①《元史》卷123《直脱儿传》，第3035页；《元史》卷94《食货志二》，第2402页；王恽：《王恽全集汇校》卷90《省罢铁冶户》，杨亮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718页。

②《元史》卷164《郭守敬传》，第3848页。

③《元史》卷163《马亨传》，第3828页；《元史》卷23《武宗纪二》，第523页；《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499页；《元史》卷86《百官志二》，第2158—2177页。

④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卷上，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0页。

⑤参见罗林：《闪米特七星神崇拜的衍生——七曜记日与数字七的图腾化》，《阿拉伯世界》2003年第1期。

⑥Tim Mackintosh-Smith & James E. Montgomery (ed. and trans), *Two Arabic Travel Books: Accounts of China and India and Mission to the Volga*. New York &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25.

⑦路易·巴赞（Louis Bazin）：《古突厥社会的历史纪年》，耿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第108页。

可汗同十七人出走”“聚集起来是七十人”，东征西战后，“结集起来的共是七百人”，突厥汗国复兴大业由是始成；《翁金碑》则载：“那时在中国的北面，在 Atig 和乌古斯人之间有七人成为了（我们的）敌人。”^①数字 7 在突厥人群中的诸番呈现形态，于此可窥一斑，它同样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②突厥—蒙古之间文化上的连续性应是明显的事实。至于突厥—蒙古人群的“尚 7”传统是否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问题，则应保持开放的立场。宗教史家米尔恰·伊利亚德在讨论神秘数字 7 和 9 在突厥—鞑靼及其他西伯利亚各民族中具有象征意义时，肯定了美索不达米亚起源的重要影响。^③换言之，突厥—蒙古人群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应予重视。此或可另举数字 72 为例，以说明之。据鲁保罗、杨希枚等学者研究，该数字在古代中国、埃及以及在《圣经》和犹太教经典中都颇受尊崇。前文所引《圣武亲征录》载：“彼军初越二山，半途为七十二灶，烹狼为食”，此即为例证。而另据《完者都史》载，伊利汗国蒙古大异密忽都鲁沙（Qutlugh-Shah）曾说：“我们都做了些什么，放弃成吉思汗全新的札撒和约孙，而去接受被分作 70 余部（seventy-odd）的阿拉伯人过时的宗教？”所谓“70 余部”之说，即与 72 数字相当，这表明该数字在蒙古人观念中亦只是个虚数，与上述其他地区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呈现。^④因此，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并不可忽视，这仍是一个开放性议题。

那为何是数字 7 呢？上世纪初叶，林恩·桑戴克（Lynn Thorndike）在其巨著《法术与实验科学史》中谈到，数字 7 在巴比伦的神话、信仰及巫术中有着突出的呈现，这一数字无疑具有神圣性和神秘性特征，并被赋予美德和完美的意义。但对于为何是数字 7 的问题，桑戴克指出，没有人能给出任何令人满意的解释，所有的解释无外乎来自《旧约全书》以及赫西奥德、《奥德赛》或其他早期希腊资料中对该数字的神圣性记载。^⑤与西方社会传统不同，内亚人群又为何会对数字 7 情有独钟呢？学者们通常会注意到其萨满信仰问题。数字 7 在萨满仪式和观念中是作为一种神秘数字存在且具有巫术的力量，米尔恰·伊利亚德指出，“萨满教意识形态或许在数字 7 的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⑥至于该如何理解萨满世界中数字 7 的问题，目前有两种解释。一种从空间（宇宙）观念进行分析，在萨满宇宙观中，有将天国分作 7 级、17 级不等；^⑦另一种解释，则是引入 7 行星理论进行分析。^⑧萨满教在 13—14 世纪蒙古人的信仰体系中占据绝对地位，数字 7 在他们的观念和意识中自然呈现突出，拥有其特殊的象征意义。

原生型数字 7 及其相关类型化数字，在蒙元时代频繁可见，我们在阅读蒙元时代文献时若遇该类数字，大可不必拘泥于其“实”指意义，而更当留心其“虚”指意义。例如，今人在探讨蒙元史研究中的地名如“朵罗安·孛勒答兀（Dolo'an Bolda'ut）”，其意为七个孤山，在推求其地望时，若以真实的“七个孤山的地形”去推求，则难免会陷于失望。^⑨有学者在论及元青花瓷的装饰带上鲜见 7 层的现象时，认为此透露出蒙古人的“数字观念”：“七却犯凶，因此，青花也要回避七”，“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元代社会

① 耿世民：《古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23—124 页、第 188 页。

② 数字 7 在突厥人群中呈现出特殊意义的问题，可参见以下著述的讨论：勒内·吉罗（René Giraud）：《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骨咼禄、默啜和毗伽可汗执政年间（680—734）》，耿昇译，乌鲁木齐：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4 年，第 172—173 页；路易·巴赞：《古突厥社会的历史纪年》，第 236—237 页；Jean-Paul Roux, “Les chiffres symboliques 7 et 9 chez les Turcs non musulmans,” *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vol. 168, no. 1, 1965, pp. 29-53.

③ 米尔恰·伊利亚德：《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段满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274 页。

④ 以上参阅鲁保罗前揭文；杨希枚：《论神秘数字七十二》，《先秦文化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654—716 页；M. Hambly (ed.), *Tārīkh-i Ūljāyūn*, 1969, p. 98. 转引自 David Morgan, *The Mongols*, Oxford &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6, p. 162.

⑤ Lynn Thorndike, *A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vol. 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3, p. 16.

⑥ 米尔恰·伊利亚德：《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第 277 页。

⑦ 米尔恰·伊利亚德：《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第 274—279 页。拉德洛夫曾指出，突厥人认为天上界有 17 层，参见 W. Radloff, *Aus Sibirien*, Band II. S.3. 转引自江上波夫：《匈奴的祭祀》，《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 9 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第 20 页。

⑧ 参见前引鲁保罗文。另，河北涿源县境内发现一座元代蒙古贵族墓，该墓融合蒙古与伊斯兰葬俗文化，墓内一具棺木的棺底上层，“有七个与北斗星类似的七个圆点”，此为元代实例。林梅村：《大朝春秋》，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 年，第 36 页。

⑨ 陈得芝：《岭北行省建置考（上）》，《蒙元史研究丛稿》，第 118 页。

重九恶七”。^①而从本文所作讨论观之，真实情形恐非如是。最后，从另一方面言之，对于该类数字在蒙元时代的呈现又不宜解读过度。如元初首立“太庙七室之制”的“七室之祀”，就是一项汉地的制度设施，《礼记·王制》早有“天子七庙”之说矣。^②总之，原生型数字7及其相关类型化数字的问题，实在值得我们重视。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元代万户府与地方路府关系研究”（19BZS045）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奇）

Reanalysis on the Culture Implications of the Typified Numbers with 7 in the Mongolian and Yuan Times

WEN Haiqing

Abstract: The number 7 and the typified numbers with 7 (7 as a multiple or mantissa) are particularly prominent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literatures during the Mongolian and Yuan Times. However, there is no practical discussion on this issue. These typified numbers actually have a symbolic meaning. By sorting out the numbers 7, 70 and 17, we can find that i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nd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Il-khanate, these typified numbers mostly present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virtual”, while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Yuan Dynasty, there are more “real” meanings. When the Yuan Dynasty records many practical matters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on that day, the “real” meaning of this kind of number is obvious; when this kind of number is used on other occasions, it usually presents a patternized phenomenon, and its “virtual” meaning is more important. If such numbers are encountered in the literatures of the Mongolian and Yuan Times, we should not stick to the “real” meaning,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virtual” meaning.

Key words: seven, seventy, seventeenth, Shamanism

① 尚刚：《苍狼白鹿元青花》，《古物新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30、234页。

② 孙希旦：《礼记集解》卷13《王制第五之二》，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43页。